

譯文  
特載

# 臺灣經濟成功事例及前瞻

René Dumont 著  
芮正皋 譯

本文譯自法國《世界報》外交週刊 (*Le Monde Diplomatique*, le 18 septembre 1985)

。作者為農業及經濟專家，巴黎大學政治學院、經社開發學院教授，曾任聯合國組織及世界糧農組織專家，考察過七十五個國家。我農發會最近曾邀其訪華。一九六〇年代非洲國家紛紛獨立時，他於一九六二年大膽發表《黑非洲走錯了路》一書，當時引起政治、經濟、學術界的很大爭議與震撼，一時洛陽紙貴成為暢銷書。衡諸今天非洲發展情況，作者的批評不幸言中。D氏著作等身，不下四十餘種。對第三世界尤其非洲的經濟、社會發展，以及蘇聯、中共農業情況尤具研究心得與權威。本文經徵得原作者同意，予以逐譯。又D氏新著《臺灣與菲律賓——天堂與地獄》一書預定於明（一九八六）年出版。

奇特美麗之島，葡萄牙人稱為「福爾摩薩」，十七世紀明朝末期，為福建省籍移民聚居，當時形成一種地主結合官吏、商賈和高利貸者的集團，共同剝削佃農的現象。十九世紀末葉，日本佔領臺灣，這種現象還是存在。但是，日本爲了工業化需要糧食，就在臺灣推廣稻米和食糖工業，使用肥料，達成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內每年百分之三·七的農業成長率，和一九三七年生產一百三十萬噸食糖的成果。至於佃農則繼續向地主提供大部份的稻米收成，自己則以蕃芋充饑。大批的稻米輸往日本。

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重歸祖國懷抱。但由於一個小販和駐軍的衝突，不幸引發了一九四七年二月的臺北臺籍同胞流血事件。總統 蔣公的部隊以及主要反共幹部於一九四九年大批湧到。他們深知汲取失去大陸的教訓，必須照顧貧苦大眾尤其辛勞的農民。

由於這個信念，加上美國的「慷慨援助」——因爲美國有意在健全的經濟基礎上建立一個反共堡壘，中華民國政府乃在臺灣實施一套三階段的土地改革計劃：一九四九年起全面實施三七五減租，也就是佃農祇需繳納總收成的百分之三七·五。這個土地

改革依法在臺灣實施，但大陸却始終沒有採行。一九五一年，所有原先屬於日本人的十三萬公頃農田，悉數以貸款方式，亦即分期每隔六月付款一次的方式，比照收成二·五倍的價格出售給農民。另外，以同樣方式，為數約十四萬公頃的田地，在每戶不超過三公頃的原則下，由政府從地主手中收購後再轉售於農民<sup>①</sup>。這樣建立了一種自耕農（平均一·二四公頃）的小型農村經濟制度，使得他們父執輩辛勤血汗耕作而無法取得所有權的土地，終於歸屬他們，而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由此而孕育、成長、發展成爲臺灣經濟奇蹟。這是世界上唯一（還有韓國）尚未終止的經濟奇蹟。這個農村社會首先從事稻作增產，但是由於發展太快（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三·五），可耕地又有限，於是手工業誕生，逐漸演變成小型工業、中型工業，等到各方資金紛紛投入，臺灣終於形成了大型工業型態。一九五三年的農業生產——當時已經恢復了戰前產量，到今天已增加三倍，但工業產量則增加了五十倍，因而使得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成爲一個工業大國。在五〇年代，臺灣已經快速地生產了原先必須進口的產品，如紡織品、成衣、雨傘、皮鞋等。有限的國內市場飽和後，也就是在滿足國內消費市場之後，產品開始外銷，這是第三世界很少見的一件事。

這種演變，得力於兼工的農人和純農人，而且是在不太有利的條件下達成的：低價農產品、重稅、和比世界市場價格低百分之二十的稻穀折價交換肥料。臺灣的糧食自給自足大體上於一九六五年達成，並且超越。當一九六九年農產品收益降低到非農產品的百分之五十八的時候，政府立即調整價格。從那時起，原先被忽視的農業受到充分保護：稻穀收購價格比世界市場價格貴三倍，玉米貴兩倍，食糖貴五倍以上……。

兼工農人變成兼農工人：祇有百分之九的小型農地地主還繼續停留在全天候的純農民崗位上，其他的農民祇是「兼差」性質；而勞力，在一九五〇年代還呈現過剩，突然感到不足。農業機械化就應時而生。但是，如何可使農業機械化而又不影響這些兼工村民辛勤所獲的珍貴農地呢？設立一種「代耕農」（entrusted farmers）制度，規模大的就成爲農業工程承攬人。七萬臺耕耨機，七千臺曳引機，二萬九千臺插秧機和二萬臺的小型收割脫穀混合機負起大部分的水稻作業。不從事耕作的農地所有人開支一切代耕費用，農產收益則歸其所有。收入當然超過支出（除了碰到颱風，可是保險公司可以賠償），由於農產品價格高昂，這一位地主就變成一位逍遙年金收益者（rentier）。

臺灣就這樣成爲一個開發國家，具有生產過剩的問題，不知何處屯放豐收的稻穀。農民的農會同時具備工會、合作社、貸款和推廣機構。農會也是臺灣農業的骨幹，能有效地達成旁的機構因受官僚主義影響而不能達成的任務。臺灣的農業開始被忽略繼

註① 日本、韓國也採行這個限額，臺灣現有可耕地約九十萬公頃。（譯者按：作者原註）

而受到照顧，是臺灣經濟發展的基礎。

臺灣本身的市場有限，於是發展她的出口工業並賴此生存。官方統計，一九八四年的國民所得為美金三千元。但是，經濟學家認為，如果加上「地下」經濟的收益，國民所得應為美金四千元，甚至更多。中國大陸的國民所得則在美金三二〇元和三五〇元之間，比臺灣低十二倍。在臺灣最貧窮的農家也有一、二輛機車、電視、冰箱和洗衣機。六百萬輛（明年可達七百萬輛！）機車，但幸好祇有六十萬輛汽車和三十萬輛大小卡車。

一九八四年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的出口達三百億美元，超越了其他三條「小龍」（南韓、香港、新加坡）。南韓需要出口收益的百分之二十五去償付外債，中華民國祇需百分之四，成為純資金出口國。在亞洲開發銀行中華民國是資金的貸出者而非借入者。中華民國建議在菲律賓設立一個加工區，表示可提供資金十億美元，加上其他水產和玉米共同合作計畫，以充分利用菲律賓的廉價勞力和幾乎免費的土地……。

臺灣的森林管理得相當好，充分地予以運用，較諸泰國、菲律賓的砍伐過度，或印尼的可以想像的森林狀況，不可同日而語。臺灣甚至向新幾內亞進軍，建議提供廣濶森林的經營計畫。因此，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儼然已成為一個有經驗的開發國家，並以更高的效能，開始邁步走上她向亞太地區經濟征服之道<sup>②</sup>，而緊跟日本。對這個強鄰，中華民國自認僅落後十年。

中華民國現有外匯存底已達二百億美元（一九八五年六月開始，每月以七億美元的數字成長），發展了煉鋼廠、造船工業和電子、電腦等工業。別忘了九年的義務教育，一流科學水準的學院，二萬二千餘名的留美學生……成立不久的高科技新竹科學園，使人聯想到美國的矽谷。臺灣經濟每年成長率為百分之七，可持續至公元二千年，屆時國民所得至少可達美金一萬元甚至一萬二千元。惟須建立一個健全的金融中心，期成為遠東另一個新加坡。

臺灣最引以自傲的是「均富成長」（Growth with equity），官方數字指出，一九七三年百分之二十的高收入者與百分之二十的低收入者之間的差距為百分之五·三，一九八三年降為百分之四·三。但也有人認為國民所得三千美元的數字不可靠，這和臺北所見的豪華的旅館、汽車滿街、郊外的豪華別墅、名貴的百貨公司等，似乎不太相稱。

臺灣是一個依賴出口的脆弱經濟，因為全靠世界市場，尤其要依賴她的第一位大主顧——美國。後者對這位成長快速的「門生」於一九八四年對美輸出九十億美元的出超，祇好無可奈何地接受。每一次世界危機雖也在臺灣引起經濟衰退，但景氣總是很快地恢復，諸如一九七四、一九七九、一九八二。但將來又如何呢？一位年輕的社會學家說：「我們三十七年來的卓越成就的事實，並不意味著我們將來也會同樣地成功」。

註② 在似乎是屬於「臺灣自己的」第三世界，包括東協各國（印尼、泰國、菲律賓等），甚至較開發的馬來西亞。（譯者按：作者原註）

一般開發國家所遭遇的問題，在臺灣由於高度的人口密度，更為嚴重。一九八五年，臺灣總人口一千九百萬，亦即每平方公里五百三十人，就可耕地言，每平方公里則達二千二百人，亦即中共的兩倍。一九五三年的人口出生率為百分之三·五，一九八五年降為百分之一·五。但要達到公元二千年官方預定出生率百分之一的目標（屆時人口二千四百萬），實在毫無把握。

美國生活方式似乎是大眾的意願。自行車已過時，除非是學生或極貧苦的人尚在使用。臺灣目前走向機動車時代。一般流行的汽車大概價值一萬美元。中產階級（佔臺灣人口的重要部分）傾向於較小型價值五千美元的車輛。國民所得預估於公元二千年可達一萬二千美元，人們有足夠能力購買汽車。如果經濟方面實現願望，人口方面將遭受壓力。美國人二億四千萬人居處於面積九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每平方公里僅有二十四人，而且人口不再增加。臺灣於公元二千年可達二千四百萬人口，每平方公里屆時將擠居六百七十人，土地仍將是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包括可耕地一萬平方公里在內。

遠在汽車數目達到一百萬輛以前，人們恐將擠得不能呼吸。中華民國的臨時首都臺北，四周都是山嶺，酷似墨西哥首都，它的空氣污染程度恐怕也接近墨西哥市。臺灣的河流百分之六十被污染，而它們的含酸量往往高達pH值五，且有酸雨，足以毀滅他們辛勤照顧的美好森林……。

臺灣是成功了，但是臺灣「模式」能否適用於從非洲到印度（尤其後者債臺高築）、從阿根廷到墨西哥的第三世界？當然，臺灣的例子顯示，臺灣的農民承繼中國古老文化的傳統勤勞精神，一旦獲得屬於自己的私有農地，即可奮發有為，而農村教育又迅速地使他們提高工作效率。有人說：「非洲不認識孔夫子」，言下之意，非洲人纔脫離未開化社會不久。此外，日本曾佔領臺灣，對當地的農村「現代化」也多少有些幫助，這點是在非洲殖民地農場或印尼所得不到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臺灣的例子無法「抄襲」。有些國家的「奇蹟」，即使不突然中斷的話，也無法趕上；如巴西「奇蹟」於一九七三年中斷，象牙海岸「奇蹟」也於一九七八年終止。

臺灣一開始就把重點放在農業優先，其次在高度保護主義下實施進口的替代，也就是自己生產進口物資，迅速地滿足大眾所需的的基本日用品，這是正確的做法。當國際貨幣基金禁止那些尚未生產足夠民生必需品的國家實施保護主義的時候，它忘了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開放關稅限制僅是一九八四年間的事。我從一九六〇年以來即不斷地大聲疾呼以農業優先作起步，其次生產民生必需品，進口替代政策不要放手得太快，在全面滿足大眾日用品之前勿過早出口。我所主張的這個經濟政策在臺灣獲得了肯定。

中南美洲國家甚至韓國對多國籍企業提供國內市場，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則僅提供三個加工區且祇准外銷；同時還規定最低限度的技術轉移，使地主國能夠有所控制。

中華民國的這種「謹慎性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e ombrageux）是一個正面因素，使得美國對臺灣經濟的——從而演變成政治的——控制，減至最低限度。